

# 卤簿钟、大晟编钟首次出展海外引起关注,本报邀请专家解读—— 辽博两件国宝青铜钟回响的北宋往事

本报记者 朱忠鹤

核心提示

日前,辽宁省博物馆的宋代皇家卤簿钟、大晟“南吕中声”编钟(以下简称“大晟编钟”)首次走出国门,亮相美国“鎔古铸新:宋元明清铜器艺术”展。记者采访中发现,这两件青铜器不一般,它们与宋徽宗有关,是“靖康之难”的亲历者,而且卤簿钟为河南省开封市复原北宋皇宫提供了参考依据;大晟编钟则见证了北宋宫廷雅乐的变革历程。

## 1 宋朝两件青铜重器被金兵掳走

3月初,“鎔古铸新:宋元明清铜器艺术”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展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馆藏的100件青铜器为基础,联合了来自欧洲、美洲、亚洲等众多机构所藏近百件珍品一起展出。展品按时间顺序排列,展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青铜艺术。

这是近年来海内外最具规模的中国宋元明清铜器展,在来自中国的近60件展品中有两件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——北宋卤簿钟和大晟编钟。“这两件文物首次在海外展出。”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筱雯说。

卤簿钟高1.84米,与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等齐,相比之下,大晟编钟高27.9厘米,较为精巧。这两件文物有相同的经历:同处北宋徽宗时期,经历了“靖康之难”,被金兵从北宋都城东京(今河南开封)掳走,在北上的途中,分别遗落他处。

辽金史专家、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介绍,卤簿钟从东京被金兵掳走后,流转到了今北京地区的

皇家寺院仰山寺。到了清朝乾隆年间,卤簿钟被加刻了乾隆的年款,运到承德。后来,军阀汤玉麟的儿子汤佐荣将其盗走,运到了奉天官邸(即辽宁省博物馆旧址)。新中国成立后,这件文物入藏辽宁省博物馆。

大晟编钟则经历了另一番命运。它被金兵掳走后,直接运送到金上京(今天的黑龙江省阿城地区),后流落到一座寺院。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,是因为在编钟的钟唇下边雕有“上京都僧录官押”七个小字。“都僧录”是金朝各京管理僧寺的最高机构。

金朝时,铜料短缺,铜器由政府专营,所以民间铜器必须送到官府检验刻记,否则就按“私铸”罪名处理。编钟上的七个字,既证明了金朝这一制度的存在,也证明了它曾在寺院驻停。

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散落各地的大晟编钟共有25件,我省有两件。除了辽博外,朝阳市建平县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同一时期的编钟。

## 2 卤簿钟悬挂于宋都城宣德楼上

卤簿钟钮高0.47米,口径0.81米,重835公斤,铸于宋徽宗宣和时期。这件造型高大、纹饰多样的铜钟之所以被命名为“卤簿”,是因为钟身上刻有“卤簿仪仗”的场景。

“卤簿”,是古代君王主持重大国事活动的典章制度,是集仪仗队、军乐团、舞蹈表演、车辆服务、交通安全、治安保卫等整体规模于一体的制度总称。

曾任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的王明琦对这件卤簿钟进行过深入研究。他认为,按照卤簿钟纹饰所表现的内容,皇宫大内的宣德门是北宋王朝的象征。宣德门在政和八年(1118年)改建,因此可以认为铸卤簿钟是为了在改建后的宣德门上悬挂。“卤簿钟是作为北宋王朝的朝钟而铸造的。”王明琦说。

作为国家重器,这件卤簿钟形体正圆,整体呈桶形,由五道弦纹分隔为六层。最上面为第一层,也就

是钟顶,铸双龙戏珠纹钟钮;第二至第四层凸铸宋朝皇家“卤簿仪仗”宏大场面,分为“车辂”“旗仗”和“宫卫”三部分;第五层为环绕钟身一周的山水图卷,气势磅礴,山势连绵,象征着北宋王朝领土广袤;底部区域图案分别铸在八个波曲钟脚上,主要是湍流中浮现出来的八位道士仙子和神话中的海洋生物。此外,钟身有两处刻款,分别为金代验刻款“右街僧官(押)宛平县仰山院官(押)”铭文和清代追刻的“大清乾隆年造”铭文。

研究发现,曾经高悬卤簿钟的北宋皇宫因战争和水患深埋地下。1985年,为了重现北宋皇宫当年的巍峨壮观与雄伟严谨,河南省开封市按照1:150的比例,制作北宋皇宫沙盘。据曾参与北宋皇宫沙盘制作的开封市政协文史研究员、开封古都学会顾问张玉发回忆,将北宋皇宫原貌重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尤其是宣德门。经多方查询,他



双龙戏珠纹钟钮

车辂场面

旗仗场面

中为宣德门 宫卫场面,正

山水图卷

中的海洋生物 八位道士、仙子和神话

高1.84米

口径0.81米,重835公斤



卤簿钟和钟身浮雕细节。

## 3 大晟编钟见证北宋宫廷雅乐的兴盛

如果说高悬于宣德门之上的卤簿钟具有国家象征意义,那么,大晟编钟则见证了北宋宫廷雅乐的兴盛。

中国音乐教育家杨荫浏在著作《中国古代音乐史稿》中指出:“在中国历史上,特别重视宫廷雅乐的,是宋朝和清朝统治者。”在宋朝,精通艺术的宋徽宗对宫廷雅乐十分看重,这件大晟编钟就是见证。

大晟编钟系青铜铸造,形制古雅,工艺精湛。全高27.9厘米,钟身高22厘米,开口长18.4厘米,宽14.9厘米,厚0.7厘米,属于椭圆筒形钟,底部平坦,仿战国风格。甬部为双瓣交接旋钮,钟两侧有36个螺旋状钟枚,钟部、舞部和篆部饰蟠虺纹。钟身正面中部以阴线刻篆书“大晟”铭文,背面正中钟部刻“南吕中声”铭文,钟唇沿下有金代“上京都僧录官(押)”验刻款。

刘宁介绍,北宋时期,音乐艺术沦落到了杂碎不堪的地步,宫廷雅乐和各种乐器亦是如此。宋徽宗主政后开始倡导恢复宫廷雅乐。崇宁元年(1102年),由宰相蔡京领导专设机构“讲议司”讨论制定大晟新乐。三年后,东京南郊设立了专门铸造大晟新乐所需的各种乐器场所。辽博所藏的这件大晟编钟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。

作为宫廷雅乐的重要乐器,大晟编钟通常以12个为一编,分成两层悬挂在制作华丽的钟架上。面对这个大晟编钟,人们有多个疑问:它为什么叫“大晟”?为什么后世的类似编钟叫“大和”?为什么大晟编钟的造型与春秋战国时期十分相似?

对上述疑问,刘宁解释,宋徽宗在为大晟乐命名时,曾下过诏书:“昔尧有《大章》,舜有《大韶》,三代之王亦各异名。今追于载而成一代之制,宜赐新乐之名曰《大晟》。”也就是说,宋徽宗赐名“大晟”,有将自己与尧、舜比肩的意思。

一些同期的编钟之所以出现“大和”字样,是因为“靖康之难”后文化融合的结果。金熙宗皇统元年(1141年),金朝开始模仿并使用宋乐制度及相关乐器,“靖康之难”中被掳走的诸多器乐成为金朝宫廷的主角。不过,因大晟编钟触犯了金

门的真实样貌。

这两件文物,一件是宋徽宗所绘的《瑞鹤图》。在这幅画里,宣德门城楼上的鸱吻与挑檐均被宋徽宗如实地画了下来。另一件文物就是这件卤簿钟。在卤簿钟的第三层,刻有北宋皇宫宣德门的完整图形。辽博的这两件文物为沙盘的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。



北宋大晟编钟。

太宗(完颜晟)的讳,所以,他们最开始用黄纸封住“大晟”二字的铭文,大定十四年(1174年),在金朝确定雅乐命名后,他们将钟器改刻铭文为“大和”。目前世界范围内至少发现了25件大晟钟实物,其中有7件被改刻为“大和”铭文。

那么,在铸铜工艺并不发达的北宋,为什么也能铸造出如此精致且又合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编钟呢?刘宁解释,这主要是因为宋徽宗精通音乐,且集合全国之力倾心打造的结果。宋徽宗广泛搜罗各地的古铜器,找到了复制春秋乐器外形的依据。同时,他还命人研究音律、和声,要求制作的钟在音色上也完全与春秋时期古乐保持一致。如此,宋徽宗时期各类乐器水平之高,铸造之精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不过,这一切在宣和七年(1125年)十二月戛然而止。当时,宋金战事正酣。宋徽宗见势不妙,裁撤了管理国家乐政的“大晟府”。两年后,即靖康二年(1127年),宋徽宗、宋钦宗这对父子连同宋廷收藏的大量金银、名画等一并被金军掳走,其中就包括了卤簿钟和大晟编钟。

(本文图片由辽博提供)

# 朝阳博物馆镇馆之宝“雷纹提梁卣”提供重要证据—— 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影响古辽西

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

## 唯一在辽宁古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容器“卣”

在朝阳博物馆新馆的二楼,即“凌河记忆”通史展中,一个独立展柜展出一件造型独特的青铜器,吸引了大量游客,它就是“雷纹提梁卣”。

“雷纹提梁卣”是朝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。其文物标志牌上不仅标清了文物名称、详细的出土地点,还特别对“卣”字进行解读,便于游客理解这件文物。

朝阳博物馆馆长王元告诉记者,“雷纹提梁卣”发现于1979年,发现者之一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当时还不到40岁,他带队到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兴隆庄镇和尚沟遗址古墓群发掘,在编号M1的墓葬中发现了雷纹提梁卣。

此前,喀左地区曾多次出土商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,如马厂沟、北洞、山湾子等地,但是这些遗址都是古代窖藏,并不是墓葬。窖藏的性质通常有两种解释,一是举行某种祭祀或礼仪活动的遗留,二是因储备、战乱等原因把遗物临时埋于地下,但后来没有再取出。窖藏出土文物一般比较集中,埋藏较浅,分布杂乱,难以取得规律性认识,进而影响了研究人员对辽西的认识。在这种情况下,可以想象当年考古工作者看到墓中出土“雷纹提梁卣”时的激动心情。

郭大顺指出,这是辽西地区首次发现有铜质容器随葬的商周之际的墓葬,说明商周之际辽西地区的先民生活中,已经出现了当时中原地区盛行的带有礼器性质的青铜容器。

## “卣”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

在我省各地的博物馆中,古代青铜器类展品特别容易唤起人们的好奇,名称古怪且造型独特,如甗(yán)、觚(gū)、觶(zhì)、罍(léi)、匜(yí)等,这些青铜器不仅铸有精美的花纹,还具有同一类器物相对独特的外形。这些青铜器的名字并不是考古人员拍脑门写下来的,绝大多数都是“自铭”,即青铜器上铸有的铭文,一般格式为“用乍+人名+器物名”,告诉人们,铸某件器物是为纪念家族某人受王册封这一重大事件。

在传世的青铜器中,卣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外。卣字在甲骨文中便已经出现,为象形字,像一个酒器的形状,金文中在酒器形中还加了个点,表示有酒。《诗经·大雅》中有“厘尔圭瓚,秬鬯(jiù chāng)一卣”。意思是,我要赏赐给你玉圭和玉瓚,并赐予你美酒一卣。

但是宋代以前,青铜卣失传,长啥样没有人说得清楚,也没有找到“自铭”为卣的器形。好在北宋时期金石学兴起,金石学家吕大临编著了

探新展 TAN XINZHAN

朝阳博物馆二楼的“凌河记忆”通史展,用文物、展板和现代声光电技术全面、生动地展示了朝阳悠久的历史,镇馆之宝之一的“雷纹提梁卣(yǒu)”被摆放在显著位置。1979年,这件文物出土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商周墓葬群,是辽西地区发现的第一件商周时期墓葬出土的铜质容器,为当时中原文化在古辽西地区的影响提供了直接证明,为建立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年谱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据。



卣字的甲骨文和金文。

高31.7厘米

腹宽18.5厘米

朝阳博物馆的“雷纹提梁卣”(左)与河北省磁县出土的扁圆体铜卣(右)极其相似。

影响深远的《考古图》,著录了数百件当时宫廷及私人收藏的古代铜器和玉器。这部金石学开山之作美中不足之处是所著录的青铜器名称有些

混乱。不过,数年之后,北宋大观初年,宋徽宗授意金石学家王黼着手编撰《宣和博古图》,将宫廷收藏的各种古器分门别类加以考订,较好解决了

这一问题,将“方口或圆口,深腹,圈足,有盖和提梁”的青铜器确认为卣。朝阳博物馆藏这件雷纹提梁卣,通梁高31.7厘米,带盖高28.2厘米,体高21.2厘米,腹径18.5厘米×14.3厘米。绳索状提梁,瓜棱形盖钮,体较扁圆,呈橄欖形。

比较我国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,这件雷纹提梁卣花纹式样与河北省磁县下七垣商代遗址出土的“受”铭文卣以及河南安阳西区的青铜卣相似。

为了让参观者从这件珍贵文物上读取更多历史文化信息,朝阳博物馆在文物标志牌上标注:“卣,盛酒器和礼器,盛行于商和西周时期,主要用于祭祀活动。其造型多为椭圆形,颈微束,垂腹,圈足,因上置提梁俗称提梁卣,也有部分方形和直筒形卣。古文献与铜器铭文中常有‘秬鬯一卣’之说,可见卣是盛放香酒等液体的祭器。”说明卣在商周之际是酒器。

## 中原文化影响辽西的确定

朝阳博物馆负责同志介绍:“雷纹提梁卣是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,考古人员可以从中读取到其所处时代大量珍贵的第一手信息,这也是其价值之所在。”

在和尚沟遗址编号M1号墓中,考古人员还发掘出土了其他几件珍

贵文物,包括一件铜壶,一对金钏,两件陶钵,其中铜壶内部还装有海贝,收集到的有70余枚。这些文物不仅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,也进一步证明墓葬的年代处于商周之际。这一考古成果为建立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年谱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据,为相关考古研究提供了参照标准。

当然,雷纹提梁卣发现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。考古人员在古墓群中出土了3件曲刃青铜短剑,这是北方游牧、狩猎民族的代表性文物。

郭大顺指出,雷纹提梁卣与曲刃青铜短剑在同一地点出土,在辽西地区是首次发现。考古人员发现,来自不同文化的古人在和尚沟遗址以近乎“融洽”的方式并存在一起,而且相互间发生了微妙的影响,例如墓葬中,基本一致地采取头东脚西、土坑竖穴木椁的葬式,墓葬规模也基本相近。这种现象所折射出来的是中原文化在辽西地区的重要影响,以及当时活跃在这一地区的以游牧、狩猎为主的古代部族对于中原文化的态度。

朝阳博物馆举办过一个重要展览“枢纽之城——辽西走廊上的朝阳”,通过文物讲述辽西走廊的故事,通过“雷纹提梁卣”,人们可以画出一条线路图来,中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青铜礼器沿着河西走廊一路伸向东北,在古老的朝阳大地上留下清晰的印记。